文化自信大家谈②

温儒敏：文化兴国运兴

采访人：本报记者 **杨　鸥**

嘉　宾：**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报独家对话温儒敏教授，听他阐释文化兴国运兴的内涵。

温儒敏近照

把文化传承和建设提到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高度

10月26日，山东省青岛小学生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展示写有“弘扬中国精神 提升文化自信”的竹简。
王海滨摄（**人民图片**）

记者：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您是怎么理解的？

温儒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这就把文化传承和建设提到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高度，让我们看得更远，更加重视复兴民族文化的工作。文化包括语言、信仰、思想、宗教、风俗习惯、法规、制度、礼仪、文艺，等等，会对整个民族、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能力与生活态度产生覆盖性的影响，起到某种规范或感召的作用，增强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尊严感，会形成一个国家、民族的集体意识，决定民族的性格。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自己特定的文化，而文化体系的生成又跟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环境资源等有关，就如同血液，带有各自种群、家族的基因。习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是文化的DNA ”，如今在十九大报告中又把文化比作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是非常恰切的，说明了文化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中华民族有过灿烂的文化，但是近代以来国家积贫积弱，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的自信显然在滑坡。现在国家在大踏步发展，物质生活逐步走向富足，但道德精神却未见得能适应时代的变迁。因此提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只有复兴民族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让我们国家的发展度过“精神滑坡”这个瓶颈，才能更好地凝聚社会人心，让中国的“雄起”获得内在生成的强力，也才真正能达到“国力”强大，重现中华民族的辉煌。

记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作为文化工作者，应如何担负起自己的使命？

温儒敏：首先要以积极、虔诚而又审慎的态度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传统文化”前面要加上“优秀”二字？传统文化是在古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本质上是顺应过去时代的，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它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糟粕，不能转化为有益于当代的成分，我们就要有分析，选择，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把真正代表民族文化“正能量”的部分、能为当今社会所用的优秀的部分加以张扬、转化与吸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基因”。笼统地提倡“国学”，特别是让青少年毫无选择地学“国学”，是不负责任的倒退。我们文史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研究，阐扬传统文化中那些有利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向善”的部分，同时也要指出那些不适合现代社会、甚至有害于社会健全发展的部分。现在有些文史专家缺少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法，一味钻故纸堆，把很多早已证明是落后的、腐败的东西翻出来，不加批判地推送给青少年，是不合时宜的。另外，还需要开阔的胸襟，不拒绝优秀的外来文化，不搞闭关锁国。还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有道理，既积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放眼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这就是文化自信。

记者：您曾提出“关注文学生活也是关注民生”。文学生活与文化复兴有什么关系？如何提升民众的文学生活质量？

温儒敏：民族文化中包括了文学艺术，是很重要的民族精神载体。比如诗骚、史传、唐诗、宋词，既是古人的情思表达，也是民族精神包括情感、思维、审美的结晶，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某种精神积淀，是思想和语言代代相传的“共同体”。为什么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习和诵读古诗词？因为这是领会和传承民族情感方式和审美习惯最好的途径。像读古诗、学语文等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行为，其实也是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当然，国民大众更多在“消费”各种书刊、影视、新媒体，也都属于当今社会的“文学生活”。所以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关注文学生活也是关注民生”的。研究文学的学者一般都把眼光聚焦在作家作品的评价上，很少注意普通读者是如何“消费”文学的。文学研究离不开“理想读者”。所谓“理想读者”，并不是大众眼里高不可及的专业评论家，而是被很多人忽视的普通读者。很多情况下，能够最直接、最真实地反映作家作品实际效果的，首推普通读者。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在“参与”文学活动。所以，普通读者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很有必要。

现今社会网络发达，影视和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多数国民最重要的文化消费，可是泥沙俱下，很多文化产品包括文艺作品都被商业化所捆绑，质量堪忧。文化工作者有责任关注当今社会的“文学生活”，张扬正能量，引导和提升公民“文学生活”的质量。这也是文化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化自信是一种肯定和坚守，信念与期望

记者：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您认为如何提升民族文化的自信？

温儒敏：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一种肯定和坚守，信念与期望。文化自信其实也是软实力，拥有这种坚定的自信，就拥有力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能众志成城，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奋进，开创美好的未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但要靠经济硬实力，还要靠文化自信的软实力，没有文化自信，也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提升民族文化自信，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要传承近代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这两个“传承”都还要落实到建设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对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要认清其独特价值、鲜明特色，认清其历史渊源、发展脉络，这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前提。当前为何要强调文化自信？就因为存在有“不自信”。对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就是一种“不自信”。历史观、价值观的混乱，其实也是因为“不自信”。重建文化自信，必须如习总书记所说，要“讲清楚中华文化”，当然包括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文化工作者这方面的责任是很重的。

提升民族文化自信，要提倡开放的文化胸襟，既尊重和传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能理性地对待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吸收他种文化的优秀充分为我所用，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养分。当然要警惕“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这本身就是缺少文化自信，还带有盲目崇洋的心态。我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就曾经提出要克服学术上的“汉学心态”。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盲目的“跟风”。有些评论家，甚至包括某些颇有名气的学者，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有些过分崇拜，他们对汉学的“跟进”，真是亦步亦趋。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借鉴，而是把汉学作为追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一种乐此不疲的风尚。所以说这是一种“心态”，是对本土学术发展不利的。另一方面，又要警惕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影响，因为这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也是有害无益的。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更新和重建的过程，其中离不开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借鉴，离不开对外来优秀文化的汲取。拿文学研究来说，没有开放的世界性的眼光和胸襟，光是回归传统，就和“汉学心态”一样偏颇，也是不可能建构适合当代社会的理论批评的。

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必须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文化自信的国民，特别要从对青少年文化自信教育抓起，这是重中之重。这些年我一直在主持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编写，对此很有体会。语文教材增加了传统古诗文和革命文化内容课文的比重，这还不够，还要想办法帮助学生去感受、了解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正确认识当代文化的“根”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要走向哪里去？这样，文化自信就能在润物无声的状态树立起来。

记者：如何推动文化的繁荣兴盛？

温儒敏：现在文化繁荣的物质条件比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文化发展的活力也正在喷发，但同样存在发展质量的问题。现在的发展基本上还是粗放的，不均衡的。大体说来，通俗文化、娱乐文化发展的势头很猛，比较高端的有品质的文化发展较滞后，而且有很多阻碍。商业资本的进入，让文化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动力，带来了新秩序和新格局，但也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拿新媒体出现后的文学生产状况来说，所谓“粉丝经济”直接左右和带动很多低俗作品的营销传播，甚至能从根本上决定影视和网络创作的走向。诸如近期在影视和网络平台上常见的“小鲜肉”“腐女趣味”“颜值崇拜”“唯美虚幻”等热点，以及对历史和经典“恶搞”的潮流，背后都拥有巨大粉丝群。这些粉丝群往往带有“极端化”的非理性特征，加上资本的推波助澜，形成自己的“意见气候”，很多时候正能量的评论是很难左右和制约这种趋势的。信息过度往往淹没了理性的正面的声音，传统的管理方式“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笨拙而无效。文化生态已经产生巨变，用常见的一句话来说，是挑战，亦是机遇。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文化重建，切实提升粉丝群体其实也就是广大国民的文化审美品格，如何改进主流文学评论和研究的格局，以及如何形成更有效地引导和均衡机制，在放手发展繁荣文化的同时，努力形式良好的文化生态，都是文化生产与管理的全新课题。

新学期，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康庄中心小学一年级新生阅读语文部编教材。　　**郝群英**摄（**新华社**发）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作《论鲁迅》演讲80周年。本文作者与两位鲁迅学生萧军、黄源系多年忘年交，特撰此文，以作纪念

萧军的鲁迅观

□ **秋　石**

萧军画像（**网络图片**）

众所周知，萧军是鲁迅的学生。进入晚年时分，他还专门镌刻了一方名叫“鲁门小弟子”的印章。

2017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陕北公学作《论鲁迅》演讲80周年纪。80年来，在解析毛泽东这篇里程碑式鲁迅专论的文章里，萧军的解读别具一格、深入到位。

萧军71岁时，在对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他和萧红的第五封信的注释中，写道：毛主席说鲁迅先生虽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的一人，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这是否“过誉”了呢？有的人也可能有这种想法。因此很不甘心情愿地让鲁迅先生享有这样的“荣誉”。

仍然是在注释这封信的时候，萧军进而予以更为准确、符合鲁迅一生实践、且结合毛泽东《论鲁迅》演讲精神内涵合二而一的评判：毛主席对于鲁迅先生的评价，我以为这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评价，它是从全面的概括，历史的发展，本质的确定，客观的实践……这一辩证标准出发的，决不是机械的、隔离（裂）的、固定的……从那种形而上学的“标准”出发的。

……

综括以上鲁迅先生对于姚蓬子“转向”的分析和看法起（此处指毛泽东《论鲁迅》中所说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的话，而毛泽东此话，恰恰是鲁迅先生1934年11月17日致二萧信中“蓬子的变化，……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的一段回覆——引者注），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原因止，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对待任何人与事，全是具体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而后才下适当的判断。如果不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人，恐怕是很难以做到这一点的罢？因此毛主席断然地给予了鲁迅先生“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这一高度评价。如果毛主席平时不是对于鲁迅先生作过全面的、深刻的研究，我以为这一评价是不会得出来的。从而也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应该是最理解鲁迅的精神和灵魂，最懂得鲁迅的伟大人格对于中国人民所起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价值的唯一的人。因此毛主席曾说过，他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

鲁迅是民族魂，在中国命运数度何去何从的危险关口，鲁迅作出了与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的正确选择。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鲁迅坚定地站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最前列，以笔作刀枪发号令，同仇敌忾面对侵略者，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正是因为对毛泽东《论鲁迅》有着与他人无法体会的深刻认识，萧军才会在1981年的美国之行中理性而出色地表现——旗帜鲜明地作出“我当然就要拥护共产党，我是他五十多年的老群众啊！”等掷地有声的回答。

1981年是鲁迅诞辰100周年。1981年8月21日，作为鲁迅学生的萧军，和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著名翻译家戈宝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濮良沛等人一道，应邀前往美国加州三藩市，出席由多所美国大学发起举行的“鲁迅遗产会议”。萧军应邀在大会上分享了他与鲁迅的交往、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成立鲁迅研究会以及宣传、研究鲁迅的一些情况。

在这次美国举行的“中国座谈会”上，一名外国作家挑战性地质问道：“中国共产党犯了那么些错误，你们为什么不换一个党啊？”

对此，萧军作出了不容置疑的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它最大的功劳，是带领民众奋斗了几十年，牺牲了那么多优秀的战士，使国家独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你找不出一个党来代替共产党，当然我就要拥护共产党，我是他五十多年的老群众啊！批评是批评，鼓掌还是要鼓掌的。

针对另一位外国人士提出的“你们中国人把鲁迅太神化了”的问题，萧军和其他中国与会者也给出了符合鲁迅一贯行为的答案：我们并没神化鲁迅，神化鲁迅的人，正是想打倒鲁迅的人。中国人之所以尊重鲁迅先生，因为他是为了全民族利益呼啸着前进的斗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真正热爱鲁迅先生的人，从来没有把鲁迅先生神化过，把鲁迅先生作为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的。神化鲁迅的人，那是别有用心的。

在上述这个答案中，萧军和他的同行者正是运用毛泽东在《论鲁迅》演讲中对鲁迅的精辟论述，加上自己与鲁迅近距离交往的直观感受，做出义正词严的诠释，从源头上化解了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士，试图从他这个一度背负“三反分子”特殊经历的鲁迅学生身上寻找突破口的阴险布局。

还有一位外国作家不解又惋惜地问道：“鲁迅先生的晚年，为什么要写杂文呢？如果不写杂文，他会写出更伟大的文学作品，他应当是个文学家……”

对此，萧军巧妙地结合提问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一个让对方心服口服的比较式诠释。萧军一连用了三个“没有”：因为你们没有受过外国的侵略，你们没有当过亡国奴，你们没有遭受过中华民族所遭受过的那么多的痛苦！所以，你们不能理解我们中国作家：他首先是一个战士，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艺术家，任何人都脱离不开社会，脱离不开政治……

会后，有外国作家教授抱怨萧军和吴组缃等在回答提问时太不客气了。对此，萧军对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同行者，寓意深刻又分外严肃地说道：“我们不能不发言那，有错误就得纠，否则你就是默认！他的有的属于不了解，有的属于误解，有的就是歪曲！帮助他们把错的纠正过来，就是最好的友谊第一。否则，他们把错误的东西又教给他们的学生，贻误了下一代，不但失去了我们这次来开会的目的，也对不起鲁迅先生。该讲情面的讲情面，朋友是朋友，真理是真理！我爱朋友，但我更爱真理！中国人必须有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和立场，丝毫不能退让。我就是要让外国人看看真正的中国作家是什么样儿！”

萧军在临终前夕，回顾自己在延安同毛泽东、彭真等中共高层领导之间无拘无束的多年交往，深有感触地说：“正因为他们二位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十分尊重，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也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和久远。”

历史上，自辗转来到鲁迅身边那一刻起，萧军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认识，从来没有动摇过“拥护”的信念。并且，他将这个“拥护”的信念定在了“鲁迅关系”的基石上，坚如磐石。